



冯永锋/文

自然大学发起人

为什么要多办“环保听证会”

最近,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建设项目举办了公众听证会。对此,有些人报以冷笑,说听证会这东西,是形式主义的遗毒,不符合中国社会运行规则;有些人则很紧张,认为听证会是不符合我国法律的。

其实,早在2005年的“圆明园铺膜防渗事件”中,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在极短的时间内举办了一次听证会。由于这是有史以来环保总局(今环保部)举办过的唯一一次听证会,因此也被当成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环保听证会”。听证的结果,最终并没有阻止圆明园的继续铺膜,使圆明园几近丧失其珍贵的栖息地。

听证会经常被刻意安排成“专家座谈会”,组建庞大的专家团,用所谓的知识和科学来封堵公众的嘴,而参会的专家是经过有意挑选的。

因此,一场好的听证会,或者说,一场合格的听证会,大体要满足三个原则。

第一,全开放。谁都可以报名,谁都可以去旁听,谁都可以传播。

第二,要以倾听反对意见为主。如果你没有反对意见,干脆不要去参加,把机会让给有能力提反对意见的人。因为,支持的意见在支持的那一方,早已经被收集和证明多次。而反对的意见在支持的那一方是不肯考虑,也不肯去进行收集的。而任何一个项目,如果只有可行性报告,没有不可行性报告,那么,这个项目的决策一定是愚蠢武断的,在未出生就埋下社会隐患的。因此,如果你有优质的反对意见,请积极参与听证会。

第三,政府不是企业的站台者,而是问题的裁判员。政府即使为垃圾处理的出路存在无穷大的焦虑,本质上也是中间方,不是项目的建设方,不是某个未确定项目的支持方。政府需要决定的是垃圾要好好处理,而不是要逼迫自己去建垃圾焚烧厂。

2013年,云南昆明传出要修建PX项目时,一些公众就建议应当对重大项目开展“社会风险评估”。当时,一些公众甚至想在云南、在北京,层层开展民间听证会训练。当然,两年过去了,受阻于多方的缺乏对话基因,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效。

因为,长久以来,只有政府一方能做决策,自然整个社会就没有对话的习惯和能力。不仅仅是政府没有对话的能力,企业也没有对话的能力;不仅仅公众没有养成对话的能力,社会组织也没有养成对话的能力。

所谓“对话的能力”,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持异议者一起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发展至今,整个社会都仍旧不习惯于和反对方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尤其不擅长多个利益相关方坐在一起解决问题。

要养成对话的能力,目前最需要的是疏,而不是堵,是大量举办。打个比方来说,一条河由于修建了一座大坝,把原来奔腾的河流都变成了死水,把原来清晰可见的温暖河道变得阴沉冰凉。因此,要让河道重新回到自由奔流的生态状态,就需要拆坝、炸坝、除坝。当然,坝有了缺口、裂缝,水自然就踊跃上前,免不得泥沙俱下,免不得浊流暗涌。

如果这时我们就被吓倒,那我们就大大地缺乏社会生态系统发展的眼光了,我们就是在堵死自己的前行之路。

社会淤积的不满情绪必须要在一次又一次的“听证会”中慢慢地疏导干净。一个久病淤滞的人,一定要做的是清理和排泄。这时候,如果继续还以害怕排泄和疏通带来的小范围震荡为理由,而一次又一次拒绝和拖延,那么,最后只会导致社会机体自身百病丛生。

当今这个社会,要有生机和希望,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让公众能做主的由公众自己做主。二是该疏导时,坚决不能再堵塞和加压。我们过去已经为堵塞和加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听证会这样的方式出现得越多,社会就越通畅和明朗,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之间,关系就越和谐共存,越泰然互信。

公众其实不在乎这个听证会是小区级、街道级,还是省市国家级。公众和政府、企业一样,都需要大量地在圆桌上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然后,就会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讨论、学会谈判。

我们的听证会办得越多,社会越文明,生态越天然。呼吁全国各地无论大事小事,都大量地办起听证会。不仅仅为垃圾焚烧厂,不仅仅为PX项目,不仅仅为环境,而为了我们社会上所可能出现的一切。

寄宿制是解决留守儿童教育的唯一措施



徐永光/文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

留守儿童大多与祖辈老人一起生活,少数的由亲友照管,还有一部分孩子单独生活,处于无人监管和教育的状态,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品德、心理、安全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寄宿制教育对于儿童成长的正面影响在世界各国普遍受到肯定。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也强调学生要“敬业乐群”。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来说,通过寄宿制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和集体生活,有助于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缺失家庭教育的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和人际交往能力,有利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同时可以降低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

曾有这样一则新闻:安徽怀宁县江镇初中留守儿童家长自愿捐款支持学校办寄宿制“托管班”,一度成为安庆市留守儿童教育的“模范”。结果以“乱收费”为由被解散,引起家长的抗议。

而我也曾在对留守儿童集中的湖南、四川等地50多所希望小学的实地调查和校长座谈中了解到,虽然学校对于留守儿童寄宿制非常认同,但还没有一所学校有能力实施留守儿童寄宿制教育。原因是农村学校依然面临经费短缺、师资缺乏的困扰。一个学校几年前为了“达标”砸锅卖铁建起了计算机教室,却花不起电费开计算机课,现在准备以50元一台的垃圾价把电脑处理掉,校长认

为“收点钱总比做摆设好”;有的学校因师资不足,一个班级挤了八九十名学生。

可以说,寄宿制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难题唯一有效的补救措施。实施留守儿童寄宿制教育需要修建学生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需要增配老师和管理人员。这一切都取决于资金的投入。

为此我建议,首先,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加快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步伐。建议在已经实施的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基础上,继续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地方政府匹配适当资金,分若干年时间实现留守儿童寄宿制的目标。

其次,政府应支持社会力量关注和捐赠留守儿童寄宿学校的设施建设。企业的这部分捐赠应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目前一些地方出现的留守儿童家长自愿付费委托学校对子女进行托管的做法,是在学校寄宿制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加强留守儿童教育管理的过渡办法,符合家长和孩子利益,不应简单以“乱收费”为名加以取缔。

(据徐永光个人网站,有改动)

关注毕节悲剧,请多一些诚意与智慧



何小手/文

舆情分析师

“公益组织可以做什么?”毕节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的悲剧发生后,这可能是很多公益人的疑惑。这一次事件发生后,公益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对围绕留守儿童开展的公益行动表达了质疑。

这几天一篇题为《中国公益人,我们没资格谈毕节悲剧》的文章在公益圈流传颇广,作者是一个从事留守儿童公益项目的公益人,正如文章的标题,他的观点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作者提到在去年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桶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很快变成“爱心省”,针对留守儿童的公益行动很快在贵州各地开花结果。但根据他的观察,公益行动带来的往往只是“印着某某机构的书包,贴着某某商标的衣物”,对于留守儿童心态知之甚少。

作者的观点引发不少质疑,有人认为其观点有些偏颇,

其所提到的问题尽管存在,但不可就此否认公益行动在救助留守儿童中的重要作用。个人认为,作者所提到的问题其实有普遍性的一面,何种苦难会成为公益人的关注焦点,恐怕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媒体报道、比如公共政策。在很多公益项目中你经常可以看到公益人功利与浮躁的一面,作者提到贵州成为爱心省,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那里的留守儿童成为了舆论焦点,又有多少是精心耕耘,在深入调查与研究之后做出的有针对性行动?

当然,依据这一次悲剧来评价过去的公益行动也有失公允。其实,除了目前公益行动从响应到动员这些层面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个人更关注的是作者所提到的留守儿童心态问题。如今的公益活动尽管形式多样,但其中大部分归根结底

其实都是扶贫。扶贫是一种便捷的公益行动,无非是向社会募捐,继而把钱或者物质分配出去,而且由于它涉及到具体数据,因此在公益效果的评价时往往显得比较好看。那么,用扶贫的思维来帮助留守儿童是否合适呢?这一次悲剧发生后,媒体就事发家庭是否贫困做出了细致的调查,人们根据常识认为是贫困导致了这样一次悲剧。然而不久这个结论就被推翻,人们开始挖掘贫困表现背后的复杂问题,于是有了所谓的“孤独论”。但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毕竟很多的自杀行为都有心态失衡的原因,孤独是较为普遍的特征。

答案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等到死者的家属现身说法,才可以揭开谜底。不过,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如果确定这个家庭并不贫困,那么在开展行动时恐怕要多一些考虑。公益人通过何种行动表达关爱,扮演类似于父母的角色,为留守儿童们提供帮助?这样的行动恐怕并不容易,物质的捐助可以一步到位,而精神扶贫则显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留守儿童问题牵涉到太多的社会问题,爱心行动即便能让人看到希望,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公益人可以探讨毕节悲剧,但具体到公益行动,还是多一点诚意与智慧。